



酋邦的演化*

◆ (美) 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 著

◆ 陈洪波 陈虹 译

(复旦大学文博系)

◆ 陈淳 校

本书是美洲研究学会举办的一个关于酋邦研讨会的成果。该研讨会的目的,是试图了解非国家复杂社会起源和演化的过程。讨论的焦点很快就集中到权力的性质上:即酋长如何迫使他人服从其指示。与会者讨论了酋邦权力的基础,大家都认为,社会的经济和意识形态以不同方式成为政治统治形成的基础和依据。

酋邦被宽泛地定义为一个地区里将数千人集中组织起来的一种政体。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具有社会等级世袭和经济分层的特点。那么,问题就变成了我们要去了解这些社会是如何从结构较简单的社群演化而来的,这些酋邦的发展与轮回,以及他们最终崩溃、停滞或形成国家。

主要建立在民族学案例比较研究基础上的关于酋邦演化的一种公认的理论观点,是将集中领导权视作解决特定生态和经济问题的一种社会方式。从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开始,酋长一直被看作是部落的“银行家”,他们为全体成员的利益管理着社群的经济。例如,酋邦的再分配被认为是为了应对日趋定居的人群在生态多样化的环境中从事农业所产生的本地特殊需求。人口增长被适应论学者认为会造成生存问题,需要技术和社会的决策。因此,要了解领导权的演化,就要分辨为有效而成功运作而实行集中管理的社会适应的经济条件。

这一确立的传统认识已经在世界上一些特定地区的酋邦演化研究中受到了批评。在酋邦中,再分配的目的不再被看作是为了要整合特定的维生经济;

灌溉系统规模似乎太小而不需要地区性的组织;而且人口密度经常相当低。由于普遍认识到过去看法的局限性,研讨会上一个新的共识就是要改变看待和研究酋邦内部社会演化的方式。

引起争论的一个主题是,应该怎样构建演化的类型?酋邦类型由于其内在变异很大,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均一的单线演化阶段。有人主张建立细致的社会类型学,把各种变异分解为不同结构类型。例如,克里斯廷森(Kristian Kristiansen)认为,尽管作为一般类型的酋邦其重要变量相同,但是这些变量构建的方式却大异其趣。正是由于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内在的不同动力特性。因此,他根据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结构对比,提出了酋邦和分层社会之间的区别。其他人,尽管接受了酋邦的概念,认为它是一种有用的分析类型,但也从某种批评的角度出发,强调了研究系统变异的重要性。

研讨会探讨酋邦内部多样性经常采用的三个方案是:

1. 从发展规模上,可以两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尽管二者之间可能是连续的。简单酋邦的政体规模只有数千人,只有一个政治等级层次凌驾于当地社群之上,等级系统是渐变的。复杂酋邦政体规模达数万人,有两个政治等级层次凌驾于当地社群之上,并且出现了社会分层。

2. 就财政基础而言,根据支付媒介的特点,可以区分为产品经济型酋邦和财富经济型酋邦,尽管在个案中二者常常混合。产品经济(staple finance)

* 译自 Earle T. The evolution of chiefdoms In: Earle, T. ed. Chief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 15.)

经常没有广泛的交换,而只是用食物和技术产品的征集和支付作为对服务的回报。产品经济的最简单形式包括提供宴饮,这在所有酋邦中都十分常见。财富经济(wealth finance)是通过长途交换或资助手工业生产,购置具有象征价值的物品,并用它们馈赠支持者。人们渴望拥有这些贵重物品,因为它们象征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特权。

3. 从结构上,酋邦可以分为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集体型酋邦通过合作劳力在建筑物上的投入来强调群体认同的重要性,这在酋邦中十分常见。个体型酋邦则强调贵族的突出地位,常常通过装饰品(通常是奢侈品)、特殊的住宅和墓葬的纪念性建筑来加以表现。

当然,了解酋邦多样性的这些方案会因影响个案的那些历史条件而变得复杂化。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就是,正是这些方案中所体现出的差异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这些动力正是我们希望在分析中搞清楚的。

研讨会还赞同,要了解演变,必须关注长时段序列的研究。尽管它在建立进化理论时有用,但在进一步民族学案例的跨文化研究中则用途有限。民族学案例研究的重点一向偏重于功能主义理论方面,很少进行严格的评估。然而,现在研究应该阐明各地区间的考古和历史序列,并且评估社会演变的异同。

与研究多样性和历时性的重要性相一致,研讨会关注了酋邦作为政治机构的动力机制。正如许多论文所清楚地表明的,这个看法已经根本上偏离了过去适应论的观点。特别是,各位研究者都在探究统治者力图扩张和维持政治控制而采用的各种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在我们的案例中,酋邦不稳定和轮回的特征十分明显,政治集中常常失败。

在考虑权力关系时,讨论常常回到民众对顺从与抗拒领导者命令之间代价的估量上。为了建立一个复杂政体,领导者必须把追随者与自己捆绑在一起;领导者必须能够控制民众的劳动。如何防止他们消极抵制、以及摆脱权力集中和经济榨取?大型群体不会自然形成,所以,要聚集和协调数量日益增加的人口,技术性和社会性的调节措施是必须的。

这些都应归因于人口压力吗?与适应论的观点相左,人口增长作为文化演变主动力的看法在研讨会上未获支持。德雷南(Robert D. Drennan)、费曼(Gary Feinman)和斯特普奈蒂斯(Vincas Steponaitis)强调,在中美洲高地的瓦哈卡谷地(Oaxaca Valley)、亚拉巴马的黑武士谷(Black Warrior Val-

ley)和哥伦比亚的拉普拉塔谷地(Valle de la Plata)等地区酋邦的密集调查中所见的人口密度都很低。在英格兰南部的早期酋邦中,人口密度可能也很低。但是,在马克萨斯群岛(Marquesas)和希腊,政治体制的演化确实伴随着人口的增长。马克萨斯的情况是,人口增加及其造成的环境恶化,使人们极易受到严重干旱的困扰,使得当地人口不得不依附于首领及其集中储备的大量面包果。在希腊,人口增长伴随着迈锡尼国家的形成。还有,在中世纪的急遽衰落之后,是人口的增长促使了城邦的出现。

一般来说,研讨会的参加者们都承认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变的原因,特别是在人口压力被证实的确强化了限制^①的地方,如马克萨斯群岛的案例。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言的共识赞成考吉尔(George Cowgill)的观点,反对人口是主动力。正如费曼等人强调的,史前期的人口增长率是如此变化无常,以至于必须对这些变化本身做出解释。借助于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基本模式,吉尔曼(Antonio Gilman)提醒大家,就家庭而言也总是存在人口压力,因为家庭规模总是面临着养活自己的压力。对生态和经济原动力(比如人口压力)的任何探究,似乎在研讨会上都遇到了反证的质疑,人们会说,“此言有理,但是例外则有……”

研讨会还关注与建立和维持地区政体相关的政治进程的性质。吉尔曼将其一言而蔽之,“首领们如何获得和扩张权力?”十项潜在的政治策略列举如下:

1. 施予(放债),宴饮,动员;
2. 改善维生产业的基础结构;
3. 鼓励限制;
4. 以对内全力使用武力;
5. 缔结外部联系;
6. 扩大依附人口的规模;
7. 对现有的法定原则进行控制(过去的、超自然的和自然的);
8. 创造或采取新的法定原则;
9. 控制内部奢侈品的生产和分配;
10. 控制外部奢侈品的获取。

在策略1和2中,首领试图通过生产和分配方式控制经济权力。如果一群人的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那么他们拒绝服从集中决策的选择余地很小。这类控制可能导致一种产品经济体制,其收租得到的剩余产品被用来供养一批不从事生产的人群。西班牙东南部灌溉系统的所有权就是这样一种

情况。欧洲铁器时代土地制度的发展可能很好地代表了一种土地所有权系统,在优化和正规化后成为一种控制维生产业的手段。在游牧型酋邦中,如非洲的特瓦里格(Twareg)酋邦和欧洲新石器时代以及青铜时代社会中,牲畜的所有权提供了经济控制的另一个基础。另外,酋长对与外部城市市场长途贸易的垄断,可能也提供了对生产技术和口粮的控制。这种交换关系在爱琴海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主导地中海东部文明的出口经济实际上促成了米诺斯和迈锡尼国家的形成。

策略3~6讲的是贵族对内推行控制,对外征服和结盟。战争被认为是酋邦的共同特征,武士们被用来征服新的社群(贡赋来源地),并对那些不愿意纳贡的社群进行胁迫。例如在希腊中世纪末期,斯巴达就通过征服进行扩张。有趣的是,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控制,其潜力似乎十分有限和不稳定。在欧洲铁器时代、西班牙东南部的阿盖里克(Argaric)青铜时代、秘鲁的曼塔罗(Mantaro)谷地,战争都很盛行,但当地酋邦却明显无法扩张空间将大量地区人口聚集起来。很多希腊小型城邦也长期保持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联合形成不断扩张的国家。武士赤裸裸的武力令人很难驾驭,所以对于地方群体来说,最可取的选择就是以防卫坚固的据点来保护自己,维持政治上的自治,战争策略实际上无疑是酋邦的特征。

策略7~10,主要依赖源自意识形态的权力,它强化了首领作为不可或缺的维持世界“自然”秩序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案例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使首领牢靠地将他们自己与过去联系起来。比如英国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的纪念性建筑,那些墓墩似乎是在令人瞩目的山丘或山脊之上安置了一条象征社群领导权的路线。同样重要的是外部联系上的竞争,以企及新的意识形态,它常常与“世界风格”有关,使得掌权贵族作为一个独立人群从大众中分离出来。比如,北欧的武士贵族就把来自遥远地中海的战车和凳子作为自己的象征符号。在中美洲高地,对奢侈品长途贸易的日益控制,以及利用舶来品吸引和控制当地人群,是酋邦发展的重要方面;密西西比酋邦中似乎也存在类似情况。贵族以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权力外部来源以证明自己的正当地位。特定的奢侈品常常与权力有关,它们象征和体现了贵族的神圣性,或至少是非本地来源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作为首领权力的重要来源有几个历史例子。在城邦出现时期,黄金时代的神话就被用作统治的意识形态;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英雄神话和保

护神,其对于建立群体的政治认同十分重要。撒哈拉游牧部落的酋长们同样运用来自外部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实施政治操控。

神秘奢侈品的使用与外来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能够用作确立地位的标志和政治资本,使政治关系物质化。因而控制舶来品分配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用来吸引当地民众并奖励他们的参与。但是,外来意识形态很容易受国际变化无常的贸易和交换条件的影响。所以,它的内在稳定性不如产品经济体制。因此,这种经济体制的不同特性就控制的整合和稳定程度而言会给酋邦造成不同的动力。

把这些神秘物品与当地仪式联系起来,也许会获得某种稳定性,就像在中美洲高地形成期文化和密西西比文化中明显体现的它们与礼仪建筑之间的联系。而在韦塞克斯的案例中,在这些祭祀地点很有可能与土地所有权有关。也可能并非完全如此,最早的礼仪建筑很可能用于建立和增强社群凝聚力的活动,而非用以强调地位差别。很多的早期酋邦似乎都比较符合伦福儒的集体型酋邦模式。

也许研讨会最热烈的讨论集中在何种权力的优先性问题上。德雷南、费曼和斯特普奈蒂斯坚持认为,在中美洲和密西西比酋邦中就土地所有权与集中储藏所见并没有严格经济控制的可靠论据。人们只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是通过被操控的“烟和镜子”(smoke and mirrors)——这是一种以祭祀建筑和交换具有神圣意义舶来品为象征和宗教约束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吸纳到社会政治系统中来。研讨会上对这种看法持怀疑态度的人被这样的见解所说服——在简单酋邦中,从下属人群中调动劳力和物品的实际数量很小,以至服从的代价很低。因为拒绝服从的代价非常小,而且控制可以用意识形态做到,那么任何强制性经济权力就没有必要了。

另一方面,吉尔曼和厄尔都又回到这一立场,即尽管权力差异存在礼仪上的约束,但是它必须立足于通过对生计的控制来控制劳力。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如波利尼西亚和西班牙东南部的案例,通过土地所有权、生产技术和储藏进行经济控制的证据是很明显的。

厄尔认为,复杂政治制度的发展不仅依靠获得权力来源,也有赖于控制权力的能力。权力确实存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多方来源,但是社会等级的建立似乎更加有赖于将其他人排除在权力之外,而不仅仅是依赖权力的来源。有人会问,权力来源是对所有人开放的,还是只属于少数人?比如在一个群体

中,是什么限制了人们接近对建立合法性至关重要的超自然权力?如果政治制度建立在不易控制的权力来源基础上,它将是不稳定的。厄尔断言,政治的稳定最终还要依赖获得能够操控经济各方面不同权力来源的能力。

这个观点被勉强接受,但是附加了一个需要说明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经济控制”的重要条件。克里斯廷森提出,在阶级真正形成之前,意识形态以自然秩序宇宙观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因此成为控制劳力和生产的一种必要因素。例如在中美洲,经济权力似乎来自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包括礼仪、远程舶来奢侈品、手工业生产和地方市场在内的复杂系统。一些与会者感到,厄尔和吉尔曼所讨论的严格经济控制对于认识酋邦起源不太合适,但只是在已经存在阶级制度的较为复杂的酋邦中才会变得重要。

解决这场争论在于所有与会者的一种共识,权力的三个组成部分(对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某种程度体现了不同的策略。弗格森强调政体如何拥有相互重迭、分层和交织的权力形态,以不同的派系和机构角逐权力。在单个酋邦之内,或竞争的酋邦之间,不同派系可能会选择不同策略以图左右对方。马克萨斯群岛的案例就描述了酋长、武士和通灵祭司们怎样以不同的权力基础相互竞争,其中任何一派都没有力量单独称霸。马克萨斯酋邦政治动力的复杂性,恐怕并非孤例,而很可能是许多酋邦的特征。有效的统治似乎有赖于多种不同策略结合使用,以便集中权力并克服单一权力来源的局限性。

作为一类案例,欧洲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受到了相当的关注。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确实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它既包括在特定场所举行的复杂的当地礼仪,也包括以舶来品作为象征的地位认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这两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似乎陷于争执,为韦塞克斯互相竞争群体各自使用。这两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都主要以经济控制为基础。与葬礼和祭天仪式相关的复杂礼仪建筑,似乎是用来标示首领所控制的生产地域,将意识形态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贵族通过仪式,以证明他们在维持当地生计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来诉求权力。从本质上说,这些纪念性建筑具体表现了一个社会和仪式的场景,这个场景属于那些维持和保卫纪念性建筑权利的人群。这些被声称拥有所有权的土地主要是用来放牧的。畜群对维持社会的生计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财富的一种可集中和生产的形式为贵族的控制策略提供财政支持。牲畜常常是宴饮的食物,首领以此

来酬报追随者们的支持。到新石器时代末,意识形态开始更加依赖来自遥远地区的财富(特别是金属)。首领的地位被一种贵族式的世界风格和意识形态所认同以便使其显赫地位合法化,就使用金属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通过武士主导的武力进行统治的技术。然而更重要的是,获得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仍然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奢侈品只能通过贵族掌握的长途交换才能得到,并且进一步由贵族资助控制的少数工匠进行加工。

各种政治策略的成败(以及采取这些策略最后得以成功的领导机构)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生态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有九种“环境”条件与政治发展的不同成功轨迹关系密切,兹列举如下:

1. 自然生产力和强化的潜力;
2. 区域人口密度;
3. 外部市场的存在;
4. 自然条件的限制;
5. 生产资源的集中;
6. 靠近所需的非食物资源;
7. 靠近贸易和交通要道;
8. 社会的限制;
9. 等级制的结构条件。

正如斯特普奈蒂斯在列举这些条款时强调的,以上条件肯定并非首领产生的充分缘由。有些案例表明,尽管具备了某些关键条件,但复杂社会并没有产生。

我们可以轻易看出这些环境条件中对酋邦发展影响特别明显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创造和提取剩余产品的那些条件许可。新生酋邦机构所依赖的这些剩余产品是以下几个条件的产物:土地的产能(条件1);保证丰产的劳力投入;(条件2);外部市场,这提供了能量的另一个来源(条件3)。第二个方面是限制人们选择并能将剩余产品调动起来流向中心的那些潜在条件。如卡内罗所说,限制实质上是对一群人选择机会的限制;它通过限制选择来提高拒绝的代价。不同环境所形成的限制也不尽相同(条件4),这在将太平洋孤立的岛屿与欧洲、中美洲广阔大陆地区之间作比较时尤为明显。这种限制就局部而言是如何集中的产物,而最容易控制的是那些高产的土地(条件5);必需的非食物资源(条件6);贸易机会(条件7)。此外还有外部政治环境,包括影响该群体社会限制的那些控制着周边土地的敌对群体(条件8)。

社会政治的内部结构(条件9)可能也会将很多

人排除在政治之外,以波利尼西亚酋邦为例,移入人群原有的社会结构明显影响着其社会发展进程。在罗马帝国及其权力经济基础崩溃之后,一种内在固有的和公认的社会不平等原则仍然继续塑造着欧洲的政治行为。

研讨会取得的一项关键共识是,环境条件并非简单地对人群起作用。反之,环境是文化和自然条件的动力组合部分,它们持续地被人类的干预所改造和创造。例如在瓦哈卡谷地,社会和经济活动最初的集中,包括礼仪、手工业专门化等活动,对当地人群构成了一种凝聚力,明显使他们集中到中心周围并使劳力控制成为可能。或简言之,尽管自然生产力的集中最初来自土壤、降雨、植被等自然因素,但通过人为干预,资源的基础很快就转变了。人类努力通过灌溉、梯田、水渠等工程改善了资源的基础;他们的活动也因过度利用引发水土流失而造成了资源的退化。在夏威夷及欧洲,这两种过程的合力起到了将生产资源逐渐集中到一些有限区域的作用,并为贵族所掌控。在夏威夷案例中,这一过程可能是意图增强经济控制的刻意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而在丹麦的案例中,则可能是个别家庭和社群为扩大土地而导致的始料未及的结果。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后果都差不多,也就是说,形成的条件都使贵族能够通过行使土地所有权而进行控制。

其它很多条件的例子大多与限制有关。像欧洲大陆,自然环境的限制有时并不明显。但是当土地已经被占据并且领土所有权分明的时候,局部人口还是受到了限制。弗格森提出一个有趣的推测,认为爱琴海的中世纪,政体之间很可能刻意挑起战争作为一种增强社会限制的政治策略。因此,酋邦的地区扩张在在消弭了外部威胁的同时实际上也削弱了它自己的控制。欧洲山头城堡的围墙既可以用来防御外敌,也能用来栓住(限制)自己的人口。

可以表明的是,不同的环境如何提供了不同的控制和经济条件。这些不同条件,以及它们造成的各种差异巨大的发展轨迹,深刻影响到不同政治策略的成败。于是,夏威夷和西班牙东南部发展强化灌溉农业的潜力,带来了严格控制当地粮食生产的可能,但是由于缺乏可移动的财产,这种潜力在空间规模上仍然有限。而财富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外来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相联,而军事上的优势可以克服这种地域局限来创造出一种扩张的政治制度。但是,对外贸易会造成对外联系的依赖,可能瓦解当地的统治形态。

如前所述,在研究酋邦的动力时,研究者们探讨了政体本身的动力。尽管酋邦的区域性结构一般被认为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但要了解酋邦的运行机制,还是应该考虑到各个不同的分析层次。最经常提到的四个层次分别是:家庭,社群,有首领的政体,跨政体区域。要认识酋邦的演化,就要认识作为半自治地位的家庭和社群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竞争及其与上层政体的对立。所以,酋邦的集中向来是一个脆弱的调停性机构,它被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正当的意识形态和武力集中聚合起来。

在讨论中,酋邦的轮回也受到了相当的关注。权力中心在一个地区移来移去,整合程度不断增长的结果最终导致崩溃。酋邦的这种轮回,原因看来是多方面的。首先而且是最基本的一点,保持政治的整合能力要求政体的领导层必须在服从与抗拒的代价之间保持平衡。假如局部和区域情况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之中,那一定会造成一种连续的失衡。第二点尚未详述,酋邦因其高职位数量有限,所以它们的政治动力具有内在的竞争性。这就意味着总是存在争权夺利。因此,这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力量:一种是集中的趋势,一些人加强集权,消灭叛乱;另一种是分裂的趋势,地方首领竭力摆脱上面的统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也许看到有些酋邦能够维持下来要比看其他酋邦的瓦解更令人惊讶。这里,严格经济控制的重要性至关重要。

但是,酋邦不能孤立地认识,而应把它们视为与地区交互作用圈(敌对政体互动)、世界经济系统(核心-周边地区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广泛互动的政体。因此,经常只有从外部关系才能够找到演化和崩溃的动力,包括政治竞争、长途交换和国际意识形态,它们将贵族们相互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程度超过了他们与各自统治的地方群体之间的联系。

我们的讨论既令人激动又让人沮丧。尽管在认识酋邦的发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对于简明综合的每种尝试都遭到批评。德雷南扮演了一个搅局者的角色,对会上提出的理论总结都加以批评。根据从中美洲、巴拿马和哥伦比亚的六个史前序列中找到的证据,他令人信服地提出,这些序列之间的差异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有些差异在各自序列的早期阶段即已表现出来,并决定了后续的发展,所以对于国家形成的任何解释必须首先考虑先前酋邦阶段的动力。这种认识使得德雷南强调差异甚于相似。一个常说的笑话是,越是对那些不甚了解的东西,我们越敢大谈其因果。从瓦哈卡和大黑谷(Big Black)

详尽考古记录中分辨社会复杂化的经济基础中就经常被指出存在这些问题,克里斯廷森强调,需要对隐藏在差别明显的考古序列背后的结构原则加以规律总结来解决这些问题。

研讨会所得出的综合基本上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认识到了社会中权力和控制来源的极端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以及始终威胁着社会瓦解的不稳定性和分裂力量的存在。酋邦的长时段轮回特别令人瞩目,它形成了局部和区域扩张和崩溃(衰退)的各种方式。

达成共识的基础是,酋邦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系统。要做到这点,注意力必须放在政治权力上,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又如何控制的。为此特别重要的是,维生经济是如何被转而用来为酋邦形成中的区域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对政治经济的控制,又通过结合使用军事手段和意识形态活动来维持的。征集的部分剩余产品,可以被用于发展经济基础,以及供养保卫和征服土地的武士阶级,也会被用于确立统治

者合法性的礼仪上。经济控制、军事力量和礼仪合法性的结合在本书的案例中是一个反复论及的话题。酋邦所依赖的控制存在多种选择,但这些选择并非毫无限制,其稳定性和发展潜力也并不相同。选择范围取决于环境、技术和个案历史的特定条件;其结果则因演化发展的速度和程度而差异极大。对酋邦政治进程与其权力和控制各种可行选择密切相关这一认识,慢慢把我们引向阐明主导社会复杂化演进的各种特点。

注释:

① 限制(circumscription):是指在某区域中的社群由于受地理环境、周边社群或资源条件的限制而在人口压力和冲突加剧的情况下无法逃离,不得不以降低生活条件和丧失自由为代价而留在这个区域内的一种状况。详见卡内罗的《国家起源的理论》。——译者注。

(上接第180页)

崇安县境增扩社仓凡十七所。淳熙八年(1181年)农历十一月己亥日,朱熹奏事延和殿,条陈七事,其四请颁行社仓条约于诸路。农历十二月宋王朝以朱熹社仓法下于诸路。朱熹倡导的社仓制度,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不啻是一种改良措施,对暂时缓和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社仓历代重修不辍,因而保存完好。最后一次修建于清光绪十五年,由朱熹裔孙乡绅朱敬熙主其事。社仓大门外的匾额为“五夫社仓”四个砖雕大字,上款为“光绪己丑仲夏吉立”,下款为“花翎郎中朱敬熙建”。大门内为院落,供挑粮者歇脚休息,约30余平方米。二门匾额为“朱子社仓”四个砖雕大字,上下款分别为“光绪乙丑仲夏”和“裔孙朱敬熙建”。二门内即为粮仓,左右并列仓廩,可容存粮六七十万千,两侧仓廩之中有宽敞通道,便于农民装粮俗时过秤记账。仓廩后面设有仓管人员宿舍。社仓面积约1400余平方米。社仓的廩票仍为五夫镇粮站存粮之用。

除上述主要者,朱熹及其理学在武夷山的遗迹还有屏山书院,兴贤书院,朱子巷等等,如今皆列入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理学研究的学术园地和海内外游客向慕的胜境。故当代学者蔡尚思有评价说:“东周出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

注释: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二十九,第12751~12770页,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史》卷三百七十,第11504~11509页,中华书局,1985年。

同上书卷四百三十四,第12871~12872页。

同上书卷四百五十九,第13462~13463页。

同上书卷四百五十九,第13463~13465页。

(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二,《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朱子全集》《名堂室记》,引自武夷山朱吉普研究中心编《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

《朱文公全集》卷九,引自同上书第161页。

(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之十·五曲,方志出版社,1997年。

a.同上书第304~305页。

b.《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引自《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167~169页。

c.民国《崇安县新志》卷十·政治

(责任编辑:渊 慧)



本期导读

一. 《酋邦的演化》

在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的战略课题中,酋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酋邦作为对 19 世纪摩尔根社会进化理论的发展和 20 世纪新进化论的重要概念,赋予了平等的部落社会与作为阶级社会象征的国家之间这个过渡阶段以明确的科学定义,使这方面的探索有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至于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和分析视野,则是始终处于发展之中的。酋邦概念最早是 20 世纪 50 年代奥博格在对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提出的,60 年代塞维斯根据夏威夷群岛原始文化的资料提出了相对比较系统的酋邦理论。此后酋邦问题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使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是美洲研究学会 1988 年 1 月举行的一个酋邦研讨会的纪要,曾发表在 1989 年 2 月号的《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上,稍作修改后又收入厄尔主编的《酋邦:权力、经济和意识形态》(Chieftdoms: Power, Economy, and Ideology)(1991 年出版)一书中。这个研讨会是该领域一流学者们的一次集会,对酋邦问题进行了非常深入全面的探讨。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不仅是对当时酋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而且对于后来包括今天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不仅探讨了酋邦的概念,更着重探讨了酋邦产生和存在的动力机制。首先,酋邦被认为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从规模上可分为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从财政基础而言,根据支付媒介的特点,可以区分为产品经济型酋邦和财富经济型酋邦;从结构上,酋邦可以分为集体型酋邦和个体型酋邦。其次,伴随对当时盛行的人口压力是社会演变主要原因学说的反思,学者们全面探讨了酋邦权力起源可能存在的所有动力,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总结为十项策略。与会者的一种共识是,权力的三个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体现了不同的策略,而有效的统治似乎有赖于多种不同策略结合使用,以便集中权力并克服单一权力来源的局限性,这是各地案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另外,会议还讨论了环境在酋邦发展中的作用、酋邦的规模与层次、以及酋邦的轮回等等其它一些重要问题。酋邦概念在 1980 年代引入中国后也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然而由于对国外文献理解上的不足,一些介绍酋邦的文章难免传递一些误导性的观点。本文作为酋邦专题讨论的纪要或综述,体现了当今国际学界对酋邦概念的认识和研究,为我们了解酋邦探究的意义提供一个比较准确和全面的认识。(陈淳)

二. 《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区的犀牛和水牛——从甲骨文中的𧐇和兕字谈起》

甲骨文中的𧐇究属何物?这篇文章从古文字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图像学、古文献学等多方面的材料出发,论证了𧐇即兕,即当时活跃在安阳地区的水牛。我们最近在名为《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刘莉、杨东亚、陈星灿著,《考古学报》2006 年第 2 期,第 141~178 页)的论文中,多处引用了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们认为圣水牛是野生水牛,中国家养水牛的起源,应该是圣水牛灭绝之后的事。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觉得应该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给不能看到原文的读者共赏。本文把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做了最好的结合,确是证据充足、说理透彻的一篇好文章,对于我们认识甲骨文的𧐇字,了解商代的水牛以及古代人类狩猎、利用水牛的种种行为都有很大帮助。(陈星灿)